



苏中公学的革命历史

□ 贾正东

位于江苏省宝应县东北20公里左右的曹甸镇有一座巍巍耸立的纪念碑，碑上有苏中中学老校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原书记夏征农亲笔题写的“苏中中学纪念碑”七个铜质镶嵌大字，塔顶装饰着当年苏中中学的校徽。纪念碑左右两侧附碑分别镌刻着苏中中学简介和书籍、枪支等图案。

苏中中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干部学校。1944年2月，为进一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战救国人才，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在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的基础上，创建苏中中学。当时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进一步明朗，中国的全面抗战也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军民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同时，新四军在苏中、苏北地区多次进行反攻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为创办学校、培养干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后方。

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对创办苏中中学十分重视，学校筹备之初，由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兼任校长，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兼任副校长，新四军一师一旅副旅长张藩任专职副校长、校委会书记，夏征农任教育长。1944年2月12日，苏中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对苏中中学的筹备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并指出苏中中学创办的重要意义：“第一是为了培养抗战建国专门人才；第二是为了创造教育经验，以为改造各地学校教育之参考；第三又是为了救济失业失学青年，谋取青年出路……”《苏中报》上刊登的招生简章显示，苏中中学设军事系、政治系、文化系等，学费、住宿费及伙食费皆免，课程教育时间为一年，分为三个学期。苏中中学的招生消息一经传出，一大批有志报国青年陆续从上海、杭州、无锡、苏州、南通等地，或从其他根据地和边远城镇农村前来报考。学校的师

资大多数来自抗大九分校，为苏中中学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年6月1日，苏中中学在校部驻地金吾庄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粟裕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我们就是要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改造成为革命的军政干部。苏中中学沿用抗大的校训和校歌。苏中中学的生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县区选送的干部；二是通过招生简章招收的社会青年；三是沦陷区输送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等。苏中中学成立后，犹如一面大旗，把黄海之滨、大江南北的优秀儿女集结到这里，通过教育和培养，使他们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苏中中学开办之初，正值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根据苏中区委的决定，苏中中学第一、二期主要进行整风教育。在教学中，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学习中国革命史并结合当时的具体形势，使大家对抗日战争的性质和任务有清楚的认识，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明确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才有光明前途。粟裕在主管军队并兼任校长期间，始终贯彻学校的办学方针和教育宗旨，关心学校教学动态，曾几次从前线回到学校指导工作，苏中其他党政军领导也经常到学校来作报告。学校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从打背包、整理内务到刺杀、投弹、射击等军事技能的训练，事事严格要求，大家逐步克服了自由散漫的习气，养成了团结紧张的战斗作风和观念。此外，1945年，在收复宝应、兴化等县城的战斗中，苏中中学组织学生进行战地服务和支前活动，在革命实践中，苏中中学的师生经受了考验，磨炼了意志，得到了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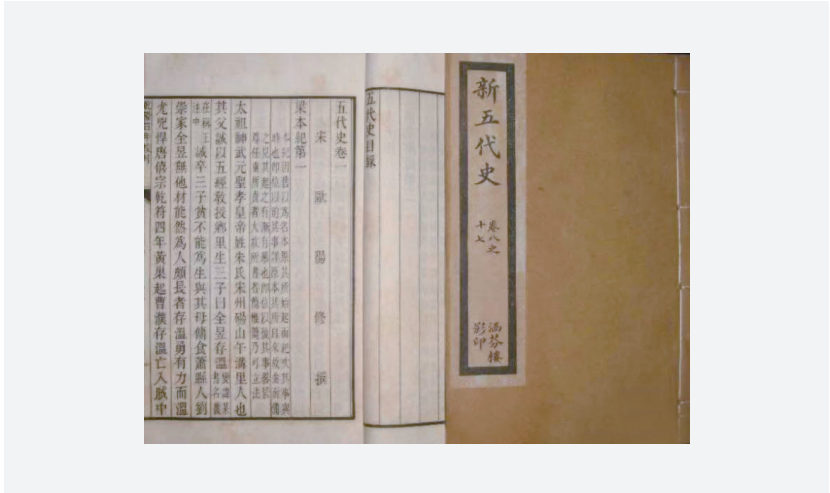
苏中中学当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没有固定的校址和课堂，没有任何教学设备，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上课、听报告都是露天席地而坐，背包当板凳，膝盖当桌子，操场当课堂。大家吃杂谷、穿粗衣、睡地铺，洗脸刷牙是河里的黄泥水。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学校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学员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前屋后、河岸沟边开荒种菜、喂猪、养鸭、捕鱼等，学校还先后开办鞋厂、碾米厂、榨油厂等以解决急需，在战争条件下起到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作用。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学员们精神面貌和斗志依然昂扬向上。大家唱着《新四军军歌》《你是灯塔》等这些明快激昂的歌曲，边学习边参加革命活动，充满团结奋进的乐观精神。苏中中学的文艺活动也非常活跃，演出的话剧《雾重庆》《前线》，秧歌剧《刘桂英是朵大红花》都很有影响，各队在课余做游戏、学唱歌、扭秧歌舞，人人参加。一位亲历者这样深情回忆：“解放区就是一所大学，苏中中学就是知识青年人生启蒙的母校。这里，没有教室，没有图书馆，总之没有校舍；但是，这里有老师，有阳光雨露，有年轻人需要的一切养料。”

1946年5月，苏中中学与雪枫大学、苏浙军区随营学校合并，组成华中雪枫大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苏中中学办学历时两年，共举办5期，为军队和地方培养输送了4000多名干部，有力推动了苏中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这些干部在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记忆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

□ 龚齐珍 孟 秀



推动经学“变古”，试图扭转宋初以来学界的守旧风气，以为政治变革之羽翼。故重修五代史有很强政治功用，是其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欧阳修自景祐年间修撰《新五代史》，直至其晚年，历时30余载，可谓苦心孤诣、耗尽心血。皇祐五年（1053年），欧阳修在写给友人梅尧臣的信中谈及“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同时又叮嘱友人，“此小简立焚，勿漏史成之语”。欧阳修深知“笔削旧史，褒贬前世”，斯事体大，疏忽不得。他慎之又慎、精益求精，还要再精加考定，才愿意公之于世。欧阳修去世后，宋神宗始诏取其书，后付国子监刻印。欧史一出，就大为流行。北宋亡后，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下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至于南宋，更是独尊欧史。

体例与内容：推陈出新

虽然欧史的一些内容也取材于薛史，但无论体例还是内容，两史都有较大不同。薛史将五代各朝断代为史，独立成书。各书之中，先本纪后列传。传主死于某朝则列入某朝传中，且不设类传。这样的设计，操作非常方便。五书之后，便是记载割据政权的《世袭列传》《僭伪列传》以及《外国列传》。薛史尊五代为正统，十国为伪朝，意在凸显继承后周的宋代为正统。但从实际历史情况来看，十国与五代并立于世，不分正伪，以立国时间论，十国犹长于五代。且《外国列传》中的一些内容，也并不恰当，这也是薛史用时短的原因之一。

欧史记载的时间断限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称帝至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年）北宋建立，共计50多年的历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十卷、十国世家年谱一卷、四夷附录三卷。体例上效法《史记》，不以朝代为界限，将梁、唐、晋、汉、周

五代的本纪、列传分别贯通。列传后，十国立为世家，不同于薛史列入《僭伪列传》，不以是否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而区别正伪。这些都是欧阳修大一统历史观的体现。列传部分，以类传形式设立，分为《家人传》《死节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等。名目繁多的列传，最能体现欧阳修的褒贬。如将皇室传记分别列入《家人传》，强调血缘宗亲是礼法正统；将不专事一朝之人列入《杂传》，将在唐禅位于梁过程中有功于后梁的六名唐朝重臣列入《唐六臣传》等，指斥不忠、褒扬死节。对历仕多朝的大臣冯道（882—954年），薛史赞其“得大臣之体”，欧史则列入《杂传》以示贬抑。当然，这样的体例编排也有一定的不足，就是强行分类未必完全准确，且有的类目人物过少，比如《宦者传》只有两人，比例失衡。欧阳修之所以这样编纂安排，应该还是出于褒扬贬抑的教谕目的。

典章制度为历来史家所重，薛史编为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十志。欧史则以“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只作司天、职方二考。欧阳修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礼乐崩坏、斯文扫地，所以只记述了天象历法和地理沿革，也即为现代所说的自然地理。欧史中的《司天考》整合汇总了薛史中的《天文志》《历志》《五行志》，以编年记载。同时《职方考》也对薛史中《郡县志》进行了增减，并采用表谱形式。欧阳修对典章制度颇有研究，在修撰《新唐书》诸志中便多有创见。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职方考》：“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此则欧公笔力，非薛史所能及。”

价值与评说：固本兴新

古今论者对薛史的评价较为一致，其优点主要集中于史料丰富翔实，而缺点在于叙次烦冗。薛史史料主要来自五代实录，保存了五代时期

大量的诏敕、奏疏，且修撰人员大多有亲身经历，存史价值很高。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注意利用薛史，明朝修《永乐大典》时也多录其文，都是出于对其史料的信赖。因《永乐大典》已散佚，现存不足原本的4%，辑佚本《旧五代史》的资料尤显珍贵。

欧史后世评论甚高。其凝聚了欧阳修毕生的新儒学思想与政治理念。苏辙称“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与迁、固相上下”。南宋以后，理学大盛，欧史以史明经的春秋笔法，更受学人欣赏，加之欧阳修声名之重，欧史地位愈发提高。清代学者赵翼云：“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文直”是指效法《左传》“尽而不汙”，秉笔直书，褒贬善恶。欧阳修以文入史，笔法精严，深得《春秋》之意，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事核”是谓考辨之功。单就史料而言，薛史编纂仓促，对史料的考辨显得不够精细。相比之下，欧史在史料搜集广度方面则更有过之，除五代实录外，又有南唐、吴越、北汉等地史料，以及金石、野史、笔记等材料，所以后人誉称《新五代史》“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时，可资参考、依据的史料较薛居正编撰《旧五代史》时更为丰富，因此，欧史不仅增补了新的史料，同时还对薛史中的错谬进行了订正。此外，欧史在内容叙事上强调“简而有法”“删繁存要”，坚持“善恶明”“是非公”的原则，加上欧阳修自身深厚的文学修养及卓越的政治才能等原因，相对于薛史的因袭墨守，欧史则更加规范、严谨，更具创新性，更有纪传体通史的独具特色。当然，对于欧史，也有学者认为有不足之处，如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认为：“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

总之，在已有官修《旧五代史》的情况下，欧阳修秉持以春秋笔法阐释微言大义之心，融汇儒家治世主张，编撰《新五代史》，其修史精神值得赞叹。这部书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辞凝练，史论结合、自成一派，既是五代十国历史资料的重要参考，也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茶香千年 生生不息

□ 罗 希

入冬午后的阳光仍然是那样热烈，一束束洒进景迈的山林里，慢慢地整座山林都浸在阳光的裹挟中，包括山间的云雾。仰慕已久，慕名而来，但真正来到景迈山，还是瞬间被这里的美景所惊艳。

位于云南普洱的景迈山，是镶嵌在澜沧江畔的一颗绿宝石，是中国著名古茶山之一，地处北纬22度，日照充沛，海拔约1000米到1700多米，山中云雾缭绕，茶香四溢，年平均气温18—20摄氏度，负氧离子含量最高达20000多个/立方厘米。晨曦微露时的云海，漫山茶林的冬樱，千年长青的古茶林，还有傣、布朗、哈尼和拉祜族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古寨，组成了这个旖旎彩云之南的秀美秘境。

沿着进山的碎石路，我们驱车缓缓前行，道路两旁的古树绿荫繁茂，周围不远处就是连片的原始森林，和天际边的白云融为一体。在景迈山森林这片广袤的绿色海洋中，茂密的树林郁郁葱葱、青翠欲滴，参天古木与寄生藤萝交相辉映，如诗如画、如梦

似幻，展现出一幅生生不息的自然画卷。斑驳的光影洒落在行进中的车窗上、人脸，让人倍感清幽，在这片绿色的世界里，充满宁静、清新与和谐。

在这片葱郁的山林中，散布着9个傣族和布朗族村寨，分别是芒景村的翁基、翁洼、芒景上下寨和芒洪，还有景迈村的糯干（糯岗）、大寨、勐本、芒埂和老酒坊等。经过一路跋涉，我们到达了翁基寨。整个寨子依山势而建，寨的正中是寨心，寨民围绕寨心建房造屋，构成了这个寨子的房屋建筑分布格局。景迈山的其他寨子各有不同，糯干（糯岗）并不依山而建，而是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更加保留了古朴幽静的原本生态；芒景寨门是一株巨大的榕树形成的天然门洞；芒洪的布朗族八角塔形制独特；勐本的千手观音树树冠遮天……

在景迈山，不管走到哪个村寨，总有茶香氤氲，好客的当地茶农都会热情地邀请你进来喝茶。在外客看来，这是礼遇；对景迈山而

言，这是日常。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当地普洱茶提供了最佳的生长条件。在热带雨林气候的滋润下，这里生长着万亩茶树，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的绝佳产地，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古茶林文化景观”。因此，景迈山的幽美、古朴、醇厚在阳光、清风、茶树的滋润下独具一格。千百年来，景迈山上的傣族、布朗族、哈尼族等各族群众和谐相处，世代与茶结缘。延续至今的传统“林下茶”种植方式和现代技术相融合，形成了“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人养茶”生态格局。如今由3片分隔防护林、5片古茶林和9个传统民族村寨共同构成山林人茶的生态系统，突出保护为主、合理利用。“春秋采摘、夏季留养”等被写入了村规民约，生动展现着边疆各族群众认识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实践，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茶树记载着这里的过去，也承载着这里的未来。

幽翠景迈山，千年茶马道。唐代以来，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形成，史称“茶马古道”。景迈山地区茶马古道始于唐宋时期“茶马互市”，至明清时期尤为兴盛。此地是滇西南各条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茶马古道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茶马古道云南段的重要驿站和交通枢纽，也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茶马古道中具有突出的文化和历史地位。

伴着耳畔悠远茶马古道的清脆驼铃，在这云海、绿林、茶香环绕的景迈山里，在水与茶的奇妙融合中，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品饮一杯景迈白茶，将这至纯大美之境、古寨民族风情，永远存留在心间，岂不美哉？

